

# Discussion on the Typical Female Images of “Angels” and “Demons” in Lu Yao’s *Life*

Yixuan Xu

School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 Abstract

Simon Beauvoir, a famous French feminist, put forward in his book *The Second Sex*: “What a man is a woman is not so much born as formed.” Men have long bee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enter, as well as cultural and discourse dominance; we can even say that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men”. Women, as “male accessories” on the edge of society, often take the initiative or are forced to accept the shaping and discipline of men, and fall into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others”. In literary works, men use the way of shaping typical female images to make the women who read the text become more suitable for their rule in their mind. That is, male women are unreal; and some influenced female writers will involuntarily bring their characters to the “ideal woman”.

## Keywords

female image; male culture; culture; Lu Yao

## 浅谈路遥《人生》中的“天使”与“妖妇”女性形象典型

徐熠轩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浙江 杭州 310018

## 摘要

法国著名女权主义者西蒙·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提出：“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长久以来，男性占据着政治经济中心地位，同时也持有文化和话语主导权；我们甚至可以说，历史是“男性的历史”。而女性作为处于社会边缘的“男性附属品”，往往主动或被迫地接受着男性的塑造与规训，陷入了“他者”文化语境。在文学作品中，男性采用塑造典型女性形象的方式让阅读文本的女性在思想上潜移默化地成为更适于他们统治的对象。也就是说，男性笔下的女性是不真实的；而一些接受塑造的女性作家也会不由自主地让自己笔下的人物向“理想的女人”靠拢。

## 关键词

女性形象；男性文化；文化；路遥

## 1 引言

在考察了大量男性作家作品和包括奥斯丁、勃朗特等在内多位19世纪女性作家作品后，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写作了女性主义经典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这本被誉为“女性主义破晓之作”“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圣经》”的书提出了一个经典发现：男女作家笔下的女性都普遍性地呈现出两种形象——天使和妖妇。这是因为大部分男性潜意识中都存有对天使和妖妇的渴望：他们既迷恋天使的美丽温柔、顺从贞洁，又渴求妖妇的淫荡风骚，甚至，他们期待自己生命中遇见的女性同时具有这两种特征，以此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性欲。

该理论虽然在20世纪提出，适用范围却极其广大。远到17世纪的玄学诗人约翰·多恩，近到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路遥，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到“天使”“妖妇”的女性形象典型。论文以路遥《人生》为例，探讨典型女性人物形象以及她们的成因。

## 2 神性为主体的“天使”——刘巧珍

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天使”型女性结合了本土文明特征，汇聚了千百年来中国女性特有的传统美德；并且，她们在文学作品中多以正面人物形象出现，或是给予失意男主角温柔的慰藉，或是抛下一切奉献于爱情和家庭。可以说，以“天使”为主体的“女性神话”在中国文学长廊中经久不衰。

路遥的笔下不乏从男性审美理想出发的“理想型女性”，如《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晓霞、《人生》中的刘巧珍、《月夜静悄悄》中的高兰兰等。不论是尚未开化“传统型”女性还是接受科学进步思想的“现代型”女性，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符合男性对“完美女性”的幻想：作为恋人，她们温顺贞洁、单纯可爱；作为妻子，她们贤惠持家、相夫教子；作为女儿，她们耐心孝顺、体贴入微；作为母亲，她

【作者简介】徐熠轩（2003-），女，中国浙江衢州人，本科，从事电影评论、中国当代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等研究。

们无私奉献、含辛茹苦。

《人生》中的刘巧珍就是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天使”形象。论相貌，她是村里有名的“盖满川”，全村最漂亮美丽的女孩。在初登场时，就被描述为“看起来根本不像个农村姑娘”“漂亮不必说，装束既不土气，也不俗气”，拥有“水灵灵的大眼睛”“白杨树一般高挑的身材”。论性格，她温柔体贴、善良痴情，参与了高加林人生的多个重要环节，在他失意的时候竭尽所能地帮助他、倾其所有地安慰他。并且，她对待感情极其专一真诚，她以男性读者喜欢的“羞涩又主动”的方式追求着高加林，甚至为了维护爱情敢于与父亲的极力干涉、村民的流言蜚语、高加林的见异思迁而对抗。论思想，她虽然从未念过书，却对知识有着无尽的渴望，希望理想中的伴侣是要有文化且又精神丰富的男人。

刘巧珍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她的“神性”，在文中则表现为德顺叔称赞的“有着金子般的心”。我们可以看到，路遥在建构这个人物时，为她赋予了一些过于理想化的品质——而这些恰恰迎合了男性读者的审美理想。例如，她的忠贞不渝和善良隐忍。她始终如一地用炽热纯真的爱慕和体贴入微的照顾滋润着高加林的内心；甚至，在高加林为了和黄亚萍在一起而背叛了刘巧珍时，她选择的竟然是默默离开，不争吵、不指责，甚至没有一句怨言；而高加林身败名裂再次回村时，她不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对他温柔相待一如从前。这是难能可贵、近乎奇迹的，也恰好是迎合男性幻想的“天使”。

### 3 人性为主体的“妖妇”——黄亚萍

倘若“天使”跳脱出“天使”的处事原则和行为规范，便会被迫地被归于完全处在二元对立面的“妖妇”之类。她们以不忠贞、不纯洁的形象出现，展现出让男人又爱又恨的魅力：一方面，男人爱她们的主动风骚，沉醉于性爱中无法自拔；另一方面，男人通常不愿承认自己会被这样的荡妇勾引，她们泼辣叛逆、自私无情，展现出更多的人性而不是神性——这与男人心目中纯净的“天使”天差地别。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妖妇”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较为极端，是极度下流、反抗性极强乃至歇斯底里的女性，如《白鹿原》中的田小娥；另一种，则是自我意识强烈、不易受男性把控甚至让男性有危机感和自卑感的女性，并因此备受批判和污名化，就如《人生》中的黄亚萍。

对黄亚萍的人物研究中不乏针对其人品和性格批判，又因为其身份和性格的特征，她时常被用来与刘巧珍作比较。黄亚萍是来自大城市上海的南方姑娘，她见多识广、聪明伶俐、家境优渥，身上散发出一种由内而外的自信。正是这份独一无二的自信，让她在同学中鹤立鸡群，成了不少人爱慕的对象，其中也包括高加林。然而，她同时具备着一种“孤傲感”，使得高加林打心底里觉得她高不可攀，暗暗地

有了自卑感。

黄亚萍作为第二类“妖妇”，是富于魅力的“妖精”形象。她广阔的知识面、姣好的面容、独特的气质无不满足了高加林的审美理想，使他深深沉迷。然而，黄亚萍面对爱情是不坚定的，甚至也是不忠诚的。这就注定了她无法满足男性对完美女性的幻想，最终只能作为“反面人物”呈现。黄亚萍虽然对高加林也有着疯狂的爱恋，但与刘巧珍真挚痴情的守护不同，她的爱更像是大城市现代化生活的产物，追求激情、新鲜刺激感、多巴胺与欲望的碰撞。她在空虚寂寞时遇见了张克南，“勉为其难”地与他成为恋人，处处使唤他，正所谓“被偏爱的永远有恃无恐”；在遇到高加林后，她的爱情之火复燃，便毅然决然作出了所谓“不忠贞”的行为——明知高加林有巧珍这个女朋友，仍然主动“勾引”他，照相、谈天、一同去西安学习，主动而暗示意味十足地示好。最终，同样不坚定的高加林一有上钩的表示，她便立刻与张克南分手，和高加林坠入爱河。然而，因为现实和理想的种种冲突，黄亚萍最终还是离开了高加林。

小说中，高加林对黄亚萍的评价是“烈性酒”，“使他头疼又使他陶醉”。这样心高气傲、优秀自信的黄亚萍，实际上并不像许多人对她的评价“渣女”“有文化没智慧”“最败男人的女人”那么不堪。我们不难发现，路遥在小说中有意将她塑造成了一个自私自利、不忠不义的“妖妇”形象。起初，她迷人又优雅，主动地“勾引”男人靠近，一旦失去价值，便狠心地抛弃。在黄亚萍和高加林分手的高潮部分，她的形象甚至近乎歇斯底里：“她冲高加林吼道：‘我实在是不能理解，你一个有文化的高中生，你一个有志青年，你居然要娶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女人，你是怎么想的，你不觉得这是一种自我毁灭吗？’”这一刻，黄亚萍的外在掩饰彻底崩盘，露出了作者意在突出的“真面目”——一个难以掌控、危险无比的“妖妇”。

### 4 《人生》中“天使”“妖妇”形象的成因

纵观全书，作者的“男性本位”思想和对女性的偏见臆想可见一斑。他塑造的两位女性，无论性格如何，都是为了满足男性角色生理、心理、地位而创造出的“美丽的工具”。

作为“天使”的刘巧珍尽管受尽溢美之词，却是在价值观和人格上都处处依赖男性的“附属品”。她虽然看似独立，却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她的自我人格实际上是完全“隐身”的。在和高加林相恋的时间中，她几乎没有遵从自我的心意，而是处处顺从高加林几乎到了“讨好型人格”的地步。尽管她的内心也有对知识和先进生活的渴望，但第一出发点往往是为了讨高加林欢心。潜意识中，她仍然自觉将自己摆在比高加林更低一头的位置，从高加林的附属地位出发演绎所谓“一直追求的幸福生活”。

刘巧珍作为不折不扣的“天使”——具有神性和男人

喜欢的品质——在男性面前既是乖顺的恋人又是体贴的母亲，同时满足男性对女性的征服欲和恋母情结。而这样“被神化”的不真实女性形象却完全符合“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与要求，本质上是男性中心文化用以压制女性的性政治策略之一。路遥在塑造一个个“天使”的时候，真的只是想展现真善美吗？还是，他从“男性本位”的角度出发，本能地意淫出了完美的“理想型女性”，再将她们推送给现实中的女性加以学习？当一本本《人生》被誉为经典，当掌握话语主导权的男性大加宣扬、赞美“刘巧珍们”的美好品质，而女性在潜移默化下对“刘巧珍”感到认同甚至发自内心想要成为“刘巧珍”时，她们便落入了父权制的“美化天使”陷阱。

而作为反面例子的“妖妇”黄亚萍，则是被“丑化”“污名化”的对象。她看似有着自我独立人格，却仍处在被塑造和凝视的“他者”地位。在她与高加林的结合中，鲜有人批判高加林作为男人对上一段恋情的背叛，却有大量读者攻击谩骂黄亚萍，认她的示好为“主动勾引”、是罪大恶极的行为；被放弃的张克南更是引起了无数男性所谓的“共情”与自我高潮。可以说，路遥是带着对女性的偏见和刻板印象来塑造黄亚萍的，他有意放大了黄亚萍身上令男性感到厌恶和恐惧的气质——自信高傲、具有野心、把爱情看得不比自己的事业重要。讽刺的是，即使是这样自我的黄亚萍，她依然为高加林而痴狂，以自己为“第二性”，默认她所喜爱的高加林该是高她一等的；当高加林失去工作、名声扫地，她便痛苦地“疯掉”。实质上，这是在从男性单一的性别偏见出发对女性合理生命价值、合理生命追求进行否定，对女性的真实性格和行为特征进行恶意篡改，以此来维护父权制度中的所谓“男儿本色”“男性自尊”。

然而，作家在塑造“黄亚萍们”时真的只有批判警告的意味吗？显然不是。危险而迷人的“妖妇”反而也是男性追求的对象——只不过这样的追求更下流、更肮脏。渴望“妖妇”的勾引，享受激情与快感，然后口口声声将这美化成“自己怀着对爱情的追求上当受骗”；同时，厌恶着她们的不贞洁，恐惧着她们强大的精神力量，惧怕她们脱离自己的掌控。——这一“渴女”又“厌女”的思维模式可以称得上是“典

型”。正因为如此，他们创造了危险重重又令人欲罢不能的“妖妇”，无数口是心非的批判谩骂跃然纸上。

诚然，不论是“天使”还是“妖妇”，不过都是男性为了维持统治地位而施行的性政策。当女性在怀着对“天使”的向往而自愿充当“天使”、逃避着“妖妇”的恶名转而成为“天使”时，两性间的冲突看似就被消解了——因为男性已经利用文学塑造进而进一步控制了女性。吉尔伯特和格巴在书中尖锐地指出：“男人的一支笔创造了女人——也禁闭了女人。”男性利用文学作品创造出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极度不真实的二元对立形象，再忽视现实中女性的本质面貌、引诱她们自我判定自己的定位，并驱使自己向看似人人称颂的“天使”靠近。这无疑令人感到不安的。

## 5 结语

当然，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和女性意识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作家尝试在作品中打破“天使”“妖妇”的形象桎梏。“颠覆天使，消解妖妇”，她们拒绝男性文化强加给女性角色的神性与美德，同时坚决反抗着恶意的污名化。她们笔下的女性不再是传统男性作家路遥之流塑造的那样贞洁顺从，而是表现出热烈的反叛姿态和自我意识——这是可喜的发展趋势，也注定是一场没有硝烟却艰苦卓绝的战役。

## 参考文献

- [1] 龙宇帆.路遥笔下青年女性形象及价值分析——以《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为例[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0,33(23):190-191+194.
- [2] 隆园.路遥作品中女性的生命书写与审美意识研究[D].长沙:长沙理工大学,2019.
- [3] 刘畅.想象与虚构的女性真相——以路遥的《人生》来谈[J].林区教学,2015(11):24-25.
- [4] 王搏.路遥笔下的女性形象塑造[D].牡丹江:牡丹江师范学院,2015.
- [5] 刘乔.当代文学“天使”书写与日暮途穷[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11):193-194.
- [6] 潘朝晖.路遥小说《人生》中女性角色的缺失[J].内蒙古电大学刊,2002(2):101-102.